

“近平把战略眼光和务实精神结合起来，很了不起”

——习近平在正定



采访对象：周伟思，1952年生。曾当过知青、工人。大学毕业后分配到《河北青年》杂志社工作。1984年，采访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，撰写报告文学《而立之年》。2014年退休。

采访组：本报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

采访日期：2017年3月24日

采访地点：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

采访组：周伟思同志，您好！1984年，您在《河北青年》杂志社工作期间，采访习近平同志并撰写了一篇反映他主政正定期间真抓实干、锐意改革、积极进取的报告文学——《而立之年》。请您讲讲采访的起因，以及到正定后与他初次见面的情况。

周伟思：1982年，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北团省委，继而到《河北青年》杂志社工作。领导看了我在上学期间发表过的一些作品，让我跨过实习阶段直接做主力记者，把很多重大采访任务交给我。时间不长，还让我当了一编室主任。这个编辑室主要负责正面典型、先进事迹及重大活动的采编。

1984年春节期间，老乡同学中有两人跟我提到习近平。他们说正定县有个年轻的县委书记，从北京来的，很能干，很有闯劲，并建议我去采访他。

第三个跟我提到习近平的，是我在赵县插队时的知青办主任李遵英，他当时在石家庄地委宣传部工作。他说：“我给你推荐一个人，正定县的书记习近平，你应该去写写他。他是自己要求下基层的，他来了以后，正定有很多新变化、新气象。”

到杂志社工作以来，不断有人给我推荐采访线索。但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推荐同一个采访对象，这还是我从未遇到过的。

我不得不对此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。当时，与南方沿海地区相比，河北的改革氛围可以说较为沉闷。各级干部的思想观念、工作作风与河北所处的“直隶”地理位置并不匹配，人们思想解放的意识明显不足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习近平这位县委书记能够带领正定县领导班子大刀阔斧搞改革，显然是一个很大的亮点。

于是，我就请李遵英帮我联系一下正定方面。

3月中旬，李遵英打电话说：“伟思，已经联系好习近平了。他确实很忙，但还是同意你采访。找个合适的时间我陪你过去。”

3月下旬的一个上午，我们俩到了正定县委办公室。两位同志和我聊了一会儿，习近平就过来了，我们握手问好之后，他说：“我正在开会，你先去招待所休息一下，下午两点我过去，咱们再聊。”

下午两点，习近平平时到我房间来，他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来正定两年，没做多少事情。你既然来了，咱们还是交流一下。你觉得有意义就继续，如果价值不大，就当聊聊天吧。”

习近平这番话，给我的感觉是这个人很随和，说话也实在，这样采访起来就比较轻松。交谈中，我们作为同龄人，很快就找到了许多共同点。

我比习近平大6个月，都刚过而立之年，同一年上的初中，都是“老初一”；都有知青经历；他插队7年，我下乡干农活5年，时间也不短；他是最后一个离开梁家河，我在湖北那个村子，也是知青中最后一个走的。

后来，我们甚至还发现有共同的朋友。

就这样，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，自然而然地，我们俩已经不像是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，而是像朋友一样在随意漫谈了。

我虽然预先拟了采访提纲，但写什么、怎么写，事先并没有一个明确想法。其实，我首先是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，这位主动申请从京城下基层的年轻人，跟大家传说中的是一回事么？

那天下午，我们说起各自插队时经历过的一些事情。我们下乡分别在北方和南方的农村，虽然地理环境不同，但对农业、农村、农民的理解和感受是基本一致的。

我原来觉得自己的下乡生活够苦的了，没想到他在陕北梁家河的日子比我还要艰苦得多。

采访组：你们聊的时候，习近平同志有没

有谈到他当时为什么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地方来工作？他主动做出这个转变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？

周伟思：这是我问习近平的第一个问题。我说，你从清华毕业，穿上军装，到军委办公厅工作，一下就站到了很高的起点上，应该说前途无量，这些简直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。可你为什么放弃这么好的条件，主动申请到一个小县城做基层工作呢？你的初衷是什么？

按照那个时代的语言特点，人们可能会回答“为了深入基层锻炼”“更直接地为人民服务”等等。但他并没有说那些绝对正确、随口就来的套话。

习近平对我说，他回到北京后，在清华上学期间也好，到军办工作后也好，节假日偶尔会参加一些同学、朋友的聚会。这些聚会，也多是知青“插友”的重逢，当年大家是一起下去的。他那些发小和同学基本都是高干子弟。“文革”结束，这些人的父母平反或升迁后，他们也陆续从各地回到北京，生活条件一下跃升回来。这样，许多人对自己在运动中、在插队时所遭受的“苦难”，或多或少都产生了一种“补偿心理”。不少人这样想：我不该受那么多罪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弥补的机会，应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，就会有有意无意地注重物质享受，安于现状。

对于这类现象，习近平开始倒没觉得什么，也还能理解这样的心理变化。但时间稍长，这种氛围让他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，他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：我们这代人就应该用这样的方式补回失去的青春吗？

7年的插队生活，使他忘不了农民的艰辛和农村的一切。即使他回到北京，从此生活优越，工作稳定，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让他内心深处始终牵挂着远方贫困的沟壑与山岭。

习近平觉得，如果我们一直在北京生活，没有多年的农村生活，每天心安理得、按部就班还算说得过去。既然亲身经历让我们深知老百姓有多苦，国家还那么贫困，我们如果还这样麻木不仁，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。

此外，他还讲了一个内心深层的动因，就是基于他对“文革”的一再反思。

他想，“文革”中，在那种人与人轮番争斗，忽视生产、经济停滞的混乱时期，我们目睹了残酷的“路线斗争”“阶级斗争”，深切感受了这场浩劫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。我们要尽力避免这样的悲剧在中国重演。怎么才能避免呢？如果我们这些亲历了这段历史，深知它有多么可怕的人，回避现实，不思进取，不去努力改变它，又由谁来担此重任呢？如果任由那些糊里糊涂的，甚至极“左”的人去掌权当政，中国的前途将是怎样？会不会重蹈覆辙？在百废待兴、改革初起的当下，我们这些有了觉悟的人，就必须站出来身体力行，投身于改革开放的第一线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能改变多少就改变多少。如果大多数人都这么想、这么做，这个国家的未来就大有希望了。

他欲奔赴“前线”的想法愈发清晰坚定，并渴望自己的同学朋友能和他志同道合，但他没法说服每一个人，只能同那些与他有相似感悟的朋友去交换意见。

在大机关上班，他平时工作勤奋，接触信息也广，加上自己用心，很多全局性的东西他都格外关注。但他仍然觉得，接触底层社会太浅，和老百姓离得太远，总觉得很“不接地气”，老有种使不上劲的感觉。同时，他也认识到，如果真正要做一些实事，像现在这样只是看文件、写文字，做例行公务，很难和人民群众直接沟通，也难以对具体事情产生作用。

渐渐地，他下基层工作的愿望变得愈发强烈，还向父母和一些长辈谈及自己的想法，征求他们的意见，表示自己“还是想到基层去锻炼，能为老百姓做一些具体的事情”。

最终，他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。

以上这些，大致上就是习近平跟我谈的他

为什么离开北京到基层来工作的初衷。今天，我们可以评价当年的习近平“有远大的政治抱负”，或者说他“把理想付诸实践”，等等，这实际上都是基于他的今天而言的。在当时，我认为他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要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，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，身体力行地做实事、影响人，能改变一点是一点，能起多大作用起多大作用。

那天，我们谈了很久，从两点钟一直谈到吃晚饭的时候。这一下午的交流，让我初步认识了自己的想法：不是主题非常集中的访谈，也不是那种通常的新闻报道。我们先以漫谈的方式展开交流，回头再看以什么样的体裁和内容更合适。习近平点点头说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然后他向我告辞，又回办公室加班去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在想，习近平这个人很平和，也颇具特色，有种吸引我的人格魅力。

采访组：在您与习近平同志初次相识后，是否也开始调研，比如收集材料、与县里其他领导干部交谈、下乡调研等等？

周伟思：是的，有这么一个过程。外围采访，收集材料是必需的。

给我帮助最多的是县委办公室的张银耀同志。我请他把习近平这两年的批示、讲话等帮我找来看看，还有，县委书记在正定做过的具体事情，在哪个乡、哪个企业讲过什么，解决过什么问题，什么地方有较大的变化，等等，也请他帮我尽量多地介绍。我下乡村地头采访，张银耀有时候也陪我去。

习近平刚来正定时任县委副书记，当时的县委书记叫冯国强，这位老同志我也拜访了。还有一位姓宋的老书记、纪检书记张五普，以及县经委主任、政研室的同志等，我都与他们进行了交谈。这期间，我还跟习近平一起骑自行车下乡调研过。

当年，记者的装备相当落后，我也不习惯使用录音机、照相机之类的东西。无论采访谁，都是拿一个本子，用笔速记。在正定县采访期间，我记了满满两本笔记。可惜的是，因为我后来工作流动性大，这两本笔记本都找不到了。

后来的日子，我和习近平断断续续的访谈交流大多是利用晚上的时间。一般都在九点钟以后，我到他办公室去找他。他的办公室面积15平方米左右，四白落地，陈旧的办公桌椅。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个小套间就是他的宿舍，大约10平方米吧，里面放一张单人床，一张桌子，桌子上面摆着水杯、瓷碗、热水瓶等。看得出来，他个人生活极其简单，完全没有什么讲究。

采访期间，我短不了离开正定回石家庄，有时开会，有时编稿，忙上几天。这期间，习近平到市里来办事，我还到招待所跟他见上一面，一起吃个便餐，聊聊天。

整个采访过程持续了两个多月。在我的记者生涯中，周期拉这么长的采访，还真是绝无仅有。

采访组：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写的那篇报告文学《而立之年》的主要内容吧。

周伟思：这篇文章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主要历史背景，用全方位的视角描述了一位年轻县委书记的日常工作和生活，以及他成长的心路历程。

文中以我耳闻目睹的真实事例，介绍了习近平自觉提高前瞻性战略思维，脚踏实地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及勇于改革创新

的精神。

写作中，我力图用平行的视线，再现这位酷爱学习、宽厚包容、勤于思考、敏于行动的同龄人，试图能让读者从中得到有益的借鉴与启发。

《而立之年》是这样结尾的：“是啊，只有当一个人的能力受到最大限度的挑战时，我们才能充分地衡量和评价他。而他，随时准备接受最大限度的挑战。一切，刚刚开始。”

采访组：采访当中，习近平同志有没有向您谈起他抓正定工作的整体思路？

周伟思：习近平说，正定靠近省会城市，有这么好的地理位置，如果只知道在地里种粮食，就把我们的生产力束缚住了。他刚到这里时，工副业占GDP的比例才只有30%，农业仍占到70%。这种情况怎么得了？经济发展的速度离中央提出的“翻两番”、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相距太遥远了！他和同志们商量，必须要将正定发展的思路进行战略大调整，必须要下决心把上面这个比例颠倒过来，让工副业、旅游业等占到总产值的70%，让农业占到30%。唯有这样，正定的经济发展才能腾飞。

他还说，正定现有的土地和人口规模，有10万劳动力种地已经足够，其他的劳动力，应该更多地投到工业、副业、服务业上面去。正定原来是北方第一个粮食亩产“跨长江”的高产县，但这却成了一个包袱。说起来很光荣，但农民的收入却不高，甚至吃不饱饭，这怎么能行呢？在那种高征购的束缚下，整个县经济发展的步伐很慢，在高征购减下来以后，县委、县政府该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经济上的开放搞活，只有抓住这一点不放手，正定的经济发展才能腾飞。

习近平深深知道，要实现这种理念上的巨大转变，他一个人再怎么强调也是作用不大的，他要将此作为振兴正定的战略思想开展工作，首先提高整个领导班子的认识，并在全县各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一场大讨论。既要让人们弄清楚这些道理，展示出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，又要有一步步切实可行的阶段目标。

他每天马不停蹄，经常到乡村去调研、现场办公。他发现乡镇干部每天最繁重的工作就是出席会议、看各种文件、接待上级部门的各种视察检查。而且，下来的领导不管事情大小，都是要找乡镇的“一把手”，这种情况下，基层干部还有多少时间做正事、办实事呢？

这类问题实在太影响效率了。他迅速反应，跟各部门约法三章：除了县委、县政府、公安局外，其他部门一律不许发定期简报；各行政单位每周必须保证2到3天的“无会日”；必要的工作考核和检查，必须轻装简从、对口接待。

“无会日”执行起来很难。虽然要求很明确，大多数部门开始执行，但还是有实在憋不住的悄悄突破。少数部门仍旧按期发简报。习近平警告他们说：你们要再这么搞，处分相关负责人，没收打字机，就是要让你们难受难受，养成新的习惯！

习近平通过各种方式，终于把基层干部从繁琐的文山会海中“解放”出来，让他们有时间实实在在地去抓生产、抓经济、抓群众生活改善。

采访组：习近平同志刚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时，教育就是他分管的工作之一，后来他逐步推进吸纳人才和人才培养等工作。请您谈一谈他在教育和人才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。

周伟思：关于习近平对正定的教育和人才所做的具体工作，应该分为3个层面来谈。

第一个层面，就是通过教育，优化正定县的“上层建筑”，改变干部的传统思维模式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，虽然沿海地区势头猛、发展快，但内地很多地方，比如正定，依旧很“平稳”，不紧不慢，安于现状，干部的思想不够开放。前面提到，习近平提出翻转农业和工业比例的问题，也有反对声音：一个农业大县怎么能搞70%的工副业，这不是不务正业吗？

习近平认识到，干部观念的转变是当务之急。正定距省会石家庄这么近，离北京也不远，但对一些新观念、新信息的接受却远远不够，落后的陈旧观念一直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。所以，他在各种场合给大家讲沿海地区发展现状、国外的先进模式和改革开放的一些新理念。

同时，他也大力抓干部的素质教育。习近平参加过、地、市的县委书记政治、经济知识统考回来后，马上要求县县直机关干部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、国民经济管理等。他亲自出题，把一些新的知识、新的思想、与改革相关的一些问题，结合本地实际进行考试，并亲自监考。通过这些，让干部们加强学习、转变观

念。后来，县机关两名电大学员的几门科目年终考试分数竟然高于北京的学员，习近平得知这个消息，开心地说：“应当好好祝贺！”在他的提议下，为党政机关一些干部开办了初高中文化补习班。

正定县委教研室的同志们对此作了概括：正定县教育干部，促使队伍素质提高，把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后备干部培养起来。县委书记对此紧抓不放，因为这是正定县经济起飞的基础。人才战略，是一切战略的战略。

第二个层面，就是抓教育的同时，也抓人才的引进。县委、县政府的大门破天荒地挂了一块人才技术开发公司的牌子。县里还登报求贤，列出优惠条件招聘需要的各类能工巧匠，由这些“外来和尚”带动本地人才的创新思维和技能更新。

那时候，正定的中学教学水平已经算不错的了，高考升学率也比较高。习近平给分布全国各地的正定籍大学生写了一封信，信上说：“国家需要你们，正定的各项建设事业同样需要你们，家乡四十五万人民热忱地期待着你们，殷切地希冀你们为正定繁荣出力献策。”他表示，如果毕业以后在外地工作，希望他们能尽量想办法和家乡挂钩，为家乡作贡献。如果能回家乡工作，政府将尽可能地为他们创造好的工作条件，各方面予以支持。

当时，正定县各行各业都需要发展，一时间找不到那么多相对应的人才。习近平想尽办法，把很多专家学者请到正定来，请他们当顾问、作辅导，让他们为正定的发展出谋划策。同时，他还请了很多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人才，让他们到正定来指导企业、开公司，有的人还是带着项目来的。他们确实为正定的商品经济发展作了贡献，同时也带动了正定本土人才的成长。

习近平对于人才的态度，可以从一件小事上看出来。

有天晚上，我到他办公室去，一进门，见他手上拿着两页纸，在窗边边看边踱步，我说：“忙着呢？”

他神色兴奋地跟我说：“这是村里一个共青团员的信，把我给骂了一顿。他认为县委抓商品生产雷声大雨点小，说我要花架子。他还从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”

习近平把信递给我看。我大致看了一遍，问他：“怎么答复？”

“这小子好像有点水平，想法也基本对头，闹不好还是个人才呢。”他笑了，“这样，我派人去考察一下，如果这个青年果真不错，我们就请他出来抓村里的商品生产。”

之后，习近平被叫去接电话了。我坐在那里吸烟，心想：他作为一个县委书记，接到一位农村青年指责他的来信，第一反应是发现人才的兴奋，是对这位农村青年的赏识。30岁的习近平能有这样的胸怀，很是我钦佩。由此也能看出，为了发展正定，他对人才的渴望是何等强烈。

第三个层面，就是重视基础教育。还是举一个我亲眼见到的例子。

有一次，我跟他和县里两位同志一起下乡，去检查基层办教育的情况。我们先去看了一个村里的小学。一进学校，习近平就皱起了眉头。

太不像样了，一条马车、拖拉机来回乱跑的大道就算是操场，嘈杂而且危险。10来间教室的窗户，没有一片玻璃是完整的，窗户上蒙着的破旧塑料布在风中“哆嗦”。“育红班”的孩子们乱糟糟地挤满一屋子，凳子不够，有的孩子只好坐在地上。

习近平问校长：“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这么破败的学校，你们怎么看得下去呢？”

校长一时语塞，无言以对。习近平严厉批评他说：“这个学校，让人看了痛心！这些孩子到了21世纪就要成为村里的顶梁柱，可现在给他们提供的是什么成长环境呢？学习的课桌是水泥板的，比凳子还低，你去趴半天试试？这样子不但培养不出人才，倒是先要出一批驼背、近视眼！你们怎么能这样浑浑噩噩过日子？”

村主任赶过来了，赶紧向习近平作解释：“村里并不算穷困，一年大约有10来万元收入，但对学校的改善一直没顾上，不够重视，到時候……”

“到什么时候？你说得清吗？”习近平脸色愈发严肃：“你们今晚就开会落实整改，下星期去县教育局报计划。至少先要窗户玻璃，有木头的课桌板凳。就你们村的条件，不应该把小学搞成这个样子，你们完全有条件改善好。如果你们还不行动，就要撤你的职！这件事还要告诉乡里，乡党委也要督促过问，否则，他们要负‘连坐’责任！”

（下转4版）